

# 数字化生存平台的哲学基础浅议

魏小巍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数字化生存平台的形成不仅是尖端电子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宏观与微观物理学、数学、思维科学等学科共同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产物,更是哲学观念与科学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现代科技理念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深邃的内在契合。数字化平台之取代自然平台,其实是人类思维中介系统与交往中介系统发生的变革。这两种中介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正是这内外双重变革造成了人类生存状态的一次根本性变化。

**关键词:** 数字化;思维中介;交往中介

**中图分类号:** B8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02 - 0028 - 04

在我们的时代,数字化,也即是狭义的虚拟,特指用0-1的数字方式去表达和构成事物及其关系。具体地说,就是用数字方式去构成一事物,或者用数字方式去代码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与现实不同但却具有现实特点的数字空间。<sup>[1]</sup>数字化生存,并非否定人的自然身体的存在,而是从现实性上看构成人的本质的种种社会关系,是由数字方式取代传统的自然方式建构而成。

表面看来,数字化之所以实现,是所谓“高科技”,即尖端电子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事实上,某一具体的高科技产品的诞生可能带有十分偶然的性质,但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平台——数字化平台的出现,同时关系到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转变,进而改变着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种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不可能是单纯一种科学技术的产物,而必然是数学、物理学、逻辑、思维科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发展、相互作用的产物,更是哲学观念与科学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的创造性思维贯穿始终并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对其思维基础追本溯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现代科技理念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深邃的内在契合。数字化平台之取代自然平台,其本质是人类思维中介系统与交往中介系统的变革。这两种中介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正是这内外双重变革造成了人类生存状态的一次根本性变化。

## 一 数字化平台的思维基础

量子物理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物质的认识,物质不得不

以能量和信息的形式被重新定义,并且在不同领域,这种界定也以不同的形态出现——绝对统一的物质概念将不复存在。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理解物质的方式。从把人作为目的、科技作为手段的角度,这种对事物的理解即“以信息作为其存在方式和自身显示的属性”,事物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信息的交流或交换”,无疑有显著的实用价值并且已经在通信、生物遗传工程等领域显示了巨大的成功。<sup>[2]</sup>

把事物的存在方式理解和看作“各种信息的综合”,把事物间关系理解为“信息的交流”就为数字化虚拟提供了理论上的前提和基础——信息可以用数字编码来表征,进而用数字方式构成事物、用数字方式来代码关系就成为可能。事实上,莫尔斯电码、布尔逻辑、申农的信息理论、维纳的控制理论都对此做出了贡献。而把虚拟变为现实的思维方式可以上溯到中国古老的“八卦图”和《易经》。

《易经》被称为“宇宙代数学”,其原因便是《易经》力图以阴阳八卦数字系统演尽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变化之无穷机理。从《易经》到二进制的数字方式构成万物,这中间一个深刻的共通的思想内涵,就是“有”和“无”这对辩证关系的辩证运动。而有和无分别在《易经》中以阳爻和阴爻、在数字化代码中以1-0获得了具体的符号形式。<sup>[3]</sup>《易经》与数字化虚拟不仅在二进制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相通性,在可能空间对现实空间的超越性,天地间万事万物变幻的相通性,万物有象、有数和以数成像的相通性这些方面,也都有着深刻的契合。西方哲学传统中也存在“万物皆数”的思想渊源。这种思想比较素朴,没有过于深奥的哲学内涵,但作为一颗蕴含思想和

【收稿日期】 2004 - 05 - 08

【作者简介】 魏小巍(1975 - ),女(满族),黑龙江省宝清县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在读博士生。

方法上的抽象和具体的混同、理性观念与经验描述的混同的科学精神的种子,以后为莱布尼兹所继承,进而提出“数字万能字母”的思想,力图以数字来表达一切。莱布尼兹的独特思想使其从中国的《易经》中发现了二进制的数字表达方式。正是其用数字表达万物的构想,以及二进制的具体计算方式,成为现代数字化构成的思想源泉,莱布尼兹也因之成为人类的“数字化之父”。<sup>[4]</sup>去除莱布尼兹的二进制观念中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的蒙蔽,我们不难发觉,数字1正是“有”的抽象,代表肯定、有序之有;数字0正是“无”的抽象,代表否定、混沌之无。

在这里,西方现代科技理念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走到了一起。

## 二 数字化平台的本质

初步探讨了数字化平台出现的思想基础之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从自然生存平台到数字化生存平台,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飞跃?我们将看到,这种飞跃,实质上是人类思维中介革命与交往中介革命的统一。

### 1. 人类思维中介系统的革命

人类思维的发展,从中介体系的角度,可以分为行为思维、语言思维、文字符号思维和数字化思维这样几个阶段。

所谓行为思维,就是行为即思维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这时的思维活动,不是通过用大脑思考,而是凭借本能反应实现的。人类语言产生以后,就进入语言思维阶段。这一阶段,语言和思想基本是同一的;语言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的方式基本保持一致;语言的界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世界的界限。文字的情况,对于使用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的人而言颇有不同。概言之,拼音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语言的特点,是对其音响形象的描摹,并通过把音节尽可能分割、细化到一个个字母的方式直接影响了西方的“无限区分”的科学理性精神。而非拼音文字,包括原始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到表意表音文字,虽然也包含和语言相关的声音传统,但更主要的是承袭了与事物的具体现实形象相联系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正与东方混沌的整体性思维特征相一致。

数字化思维的特征与以前几个阶段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高度抽象化,抽象到了几乎不依靠任何具体形象的程度。其次,数字化思维对事物、事件的分割可以进行无限的细化,其细化程度只取决于需要的程度,而不存在理论上的限制,这可以说是达到了科学分析传统的极限。与此同时,数字化思维又因其极端的抽象化、简单化和分割的无限性,反而实现了向整体性的复归。这是由人的认识的特点决定的:人只能通过间断的、割裂的方式认识连续的、一体的世界,当间断足够简短、分割足够细致,分割后的时间和空间在人脑中重新整合的形象就越来越接近事物的完美形象。

这样,以数字符号为中介的数字化思维就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 2. 人类交往中介系统的革命

人类的交往实践活动,在马克思早期著作里具有比较宽

泛的内涵,他使用的 commerce 一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sup>[5]</sup>而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语境下,甚至可以把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人与天地万物、宇宙神灵的交往都涵盖进来。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交往活动可以抽象地理解为人与外界的信息交换活动,而信息,其内容也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sup>[6]</sup>。这里我们只针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交往的中介体系,也就是信息交流和传播的媒介系统。人类交往中介体系的发展,由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数字化技术的发明划分成了三个历史阶段。

交往中介系统的革命与思维中介系统发生的变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交往活动的特征是必然要通过他物而最终指向自身。在交往中介系统发展中,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人类的交往史发生了第一次飞跃,数字化技术的发明则缔造了第二次。

语言的创造、文字的发明对人类交往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人与人的交往、信息的传播基本上以口耳相传为主,这种交往形态还是以自然性为主要特征。直到印刷术发明和传播以后,拼音文字、非拼音文字与印刷技术的结合,才造成了这种自然状态的剧烈变化。拼音文字与印刷技术的结合保证了视觉偏见取代以往的视听一体的首要地位。线形的、一致的、可重复的铅字这种新媒介,以无限制的数量和以前不可能的速度复制信息,使眼睛在人的感官系统中稳获霸主地位。印刷术是人的一种急剧的延伸。它塑造和改造了人的整个环境——心理和社会的环境。它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根本不同的、而且似乎是不可比的现象的兴起。结合了拼音文字的印刷术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二者携手并进。印刷术是复杂手工艺的第一次机械化。印刷术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可重复性,这种它的可重复性是机械原理的根源。自其发明以来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就是这个机械原理。它产生了第一种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商品。活字印刷是一切后继的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形。没有拼音文字和印刷机,现代工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印刷术的拼音文化不仅仅塑造了生产和营销,而且塑造了生活的一切其他领域。<sup>[7]</sup>汉字与印刷术的结合产生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政治权力的巨大拓展,中央高度集权的日渐加强和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但印刷术的可重复性和整齐划一,以及造成信息规模的急剧膨胀进而对人的思维、心理、社会交往方式造成颠覆性的影响这一点上,中西两种传统并无不同。

如果说印刷技术使得信息由小溪合流成江河,那么数字化技术则让江河汇集成大海。数字化技术造成的信息含量之丰富、信息交往之快捷可谓前所未有。这种状况常常被形容为“信息爆炸”。信息爆炸对人的影响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 1、信息量的急速增加给大脑的辨别、选择能力带来了挑战。比如就资讯信息来说,它的迅速增加从根本上损害了大脑对意义与噪音进行有选择的辨别的能力。

- 2、信息语言的增加瓦解了语言原有的语法结构和表征

意义的逻辑体系,从而瓦解了传统语言的表征功能的根基。

3、新型的互动式的、即时的交流方式,也要求大脑迅速进行选择、判断和决策,传统的隽永的表达与现代的瞬息即逝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也造成了传统表征语言的危机。

4、交往模式由层式结构转变为网状结构,造成了一切传统权威阶层的消失,由某一阶层制定的或由风俗习惯遗留下来的一切行为规范和准则在短时期内突然失去效能,这使得整个社会的根基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 三 数字化平台的发生机制

下面我们要进一步考察,数字化平台形成的实质——人类思维中介系统与人类交往中介系统的双重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即这一双重革命是如何从根本上变革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的?

从思维形式上看,数字化平台使之在这样几个层次上实现了飞跃:

第一,思维中介符号实现了从行为符号、图形符号、语言音响符号、文字符号到数字符号的飞跃。考古文献中有据可查的记载从图形符号开始,如中国古老的太极图和阴爻、阳爻的图形表示,原始的图形符号那里还带着玄奥深邃、神秘莫测的气息。思维中介符号的表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语言音响符号、文字符号。这段发展历程与人类思维发展到以语言符号系统和文字符号系统为思维的中介相对应。思维中介符号的最高级的形态是数字符号形态。0和1摆脱了语言、文字的束缚,既蕴涵了语言文字可能蕴涵的各层含义,又挣脱了语言文字造成的语义枷锁、话语霸权;同时,由于0和1表达方式的简单明了,提供了计算机模拟的可能性。二进制的表现方式并不局限于数字,但数字表现方式的确立使其获得了清晰明了的数学逻辑表达,明确直观的语义和更便于掌握、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可操作性。有和无的现代表现形态对人类未来生活的影响将极其深远。

第二,对世界包括人自身的认识实现了从确定性向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综合的飞跃。列宁早已指出,“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sup>[8]</sup>。这既是思维本性中的矛盾,即必须把复杂的東西简单化,运动的東西静止化,不间断的东西间断化,思维才能运动起来,才能使这些“不间断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具有可表述、可定量、可描述的现实性;同时也是语言符号表达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即我们通过语言只能表达静止的间断的东西。而二进制的数字方式中的“0-1”,代表开-关、肯定-否定、阴-阳等,也无非是对具有对立意义的两方的一种二选一的选择过程,但二进制是把事件或事物分解为许许多多的事件单元或属性单元,是模仿人脑意识的工作原理,通过大量高速的不断选择而达到合目的的行为过程,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虚拟过程。这种对事件的考察与以往已有了质的不同。这就是,二进制本身具有机械的确定性,即每一次只能从0或1中作出选择,但大量的这种随机事件构成的事件系统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这是一个用确定性来

表达不确定性、用确定性来逼近不确定性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的一次极大的跳跃。

第三,认识过程实现了从通过间断认识连续向用间断无限逼近连续的飞跃。我们的生活世界本身由连续的时间和连续的空间构成,这种时空本身又是连续发展变化的,处于时空中的事物也同样处于永恒的永不间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而我们思维的本性却只能认识静止的和间断的东西,我们也只能用语言表达静止的和间断的东西。在传统体系中,对世界进行的解读是无法调和和解决这种矛盾的。而二进制的数字方式不再是通过把复杂的東西简单化、运动的東西静止化、连续的东西间断化的方式来认识事物,即不再通过间断化来表述、认识连续,而是用间断性来表达连续性,用间断无限地向连续逼近。数字0、1是间断的,但通过其大量、高速的选择可以实现对连续的任意程度的逼近。

第四,在思维的层次上实现了从有限向无限的飞跃。0-1是一对最为简单的有限的数字,但却可以以之为基础代码事物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在思维的广度上,实现了从宏观视野向宏观和微观视野相结合的整体观的飞跃。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宏观的大化的方式,而数字化是通过大量微观的细致描述达到对事物总体的认识,结合了微观视野的面面俱到、毫厘不爽,又达到了宏观的整体效果。

同时,数字化平台的发展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趋向于把各种不同类别的系统及其结构通过统一的方式揭示出来,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传统,即把纷繁的世界用一致的、统一的原则加以解说,这也和西方近年出现的几种新兴学科,超循环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以及协同论发生了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这些思想将“使得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对世界更为深刻的理解”<sup>[9]</sup>。

对于交往中介系统而言,从自然平台到数字化平台发生变革的原因在印刷术发明之时就埋下了种子。首先是识字让人用眼睛代替耳朵,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带有表意成分的文字承袭了原始思维的整体性,但占主导地位的与科学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方拼音文字用线形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了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人。这种形声和语义的割裂会造成深刻的心理影响。人的想象力、情感和感知生活就要发生相应的分离。他将开始用序列、线形的方式推理,又开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类。<sup>[10]</sup>但这种影响的广泛性与普遍性要到拼音文字与印刷这种传媒技术结合的时候才充分体现出来。当数字化技术在社会中普遍应用,其对人的交往关系、进而造成的心理影响更加深入。

第一,一切理性规范的消解。数字化技术发明以前的时代,理性规范一般由凌驾于民众之上的某种权威所制定,或是经历史、传统形成的约定俗成。外部的理性规范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孟子所说的生而为人就必然具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所谓“四端”。而数字化技术的诞生,使以往的所谓权威、习俗彻底丧失了约束力,因而一切规范与传统都迅速土崩瓦解。外部约束的解除也必然影响到人内在的自我约束力量的形成、发展和效能的发挥。

第二,自我确认方式的剧变。交往的本质,从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自我确认。通过对儿童认识发生机制的研究已基本证明了,幼儿从“镜像阶段”——即对镜子中自己的形象产生好奇——开始,在与他人、外界的不断交往中逐渐完善着对自身的认识。因而交往中介系统直接影响着自我确认的过程和结果。在印刷技术占主宰的阶段,自我的建构几乎完全被君权、上帝或其他某种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所左右,这种背景下的自我是理性自律的中心。而数字化技术的特征是一种持续的不稳定性,各种对自我认识的形成可能发生的影响都是稍纵即逝,这导致的结果是各种认识来不及巩固和完善即已消解,进而形成的是种分散、多元、无中心的主体。

第三,交往方式与生存状态的进一步非本真化。与印刷技术一道兴起的工业革命——马克思在其早年的《巴黎手稿》中即已指出——是人的自然生存状态的“异化”。但这种异化的程度,与数字化技术造成的相比,相形见绌。前者开启了人类非本真的生存状态,后者则彻底颠覆了人的自然生存状态,并且完成得神鬼不觉。数字化技术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极为轻松便捷,表面上看来,似乎清除了所有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了远程、时时交流,与人相比体积颇为庞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庄。然而,这种交往事实上是在交往主体缺席的情况下完成的。即是说,在远程时时交流的背后,遮蔽了交往主体的真实面目。交往主体因其不在场变得可有可无,进而交流的内容也是不重要的,剩下的、切实的只有空洞的交往形式。

#### 四 数字化平台的深远影响

思维中介系统从内部,交往中介系统从外部,对个人的心理、以至整个社会心理,对社会即有的分层组织结构,共同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但思维中介系统与交往中介系统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交往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与人具有最为切近的同—性质,实践常常被看作人的存在方式。脱离了实践活动单纯探讨思维活动,容易沦为思辨的语言游戏。事实上,这两种中介体系从来都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

数字化平台建立了无中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绝对平等的网络式交往结构,这种结构在这样几个方面直接影响和塑造着人的思维结构:

##### 1. 交往的自然基础的完结与思维建构的自然基础的瓦解

前文字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决定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主要以自然存在状态为基础;文字-印刷术时代,人与自然分庭抗礼,以理性作为对抗自然的资本,和自然划分界线,并以此为荣,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也就是通过“理性”确立的;数字化时代,人的自然存在在交往活动中变得可有

可无,人之为人安身立命的依托完全脱离了自然的性质,成为某种不确定的、具有很大任意性的存在。思维的对象、思维建构的基础、反思的基础也随之脱离了自然存在物,依托于数字建构起来的没有实在性的基础之上。

##### 2. 交往的高度自由、价值多元与思维的分散性、无中心性

数字化平台上的交往具有最大限度的随意性,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身份、带着任何信息介入任何一个社群之中。表面上看起来基于这种中介的交往自由程度和民主化程度非常之高,但这种极大的自由和民主同时正表现了绝对的价值多元取向,也表明了个人存在的无足轻重。任何一种声音进入数字化平台都只能变成大海中的一滴水,连声音的主人也无法分辨清楚。在自然平台上建构起来的“行为者”失去了信息发送和反馈的对象,无法确认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将自我作为中心和主体。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思维只能是分散而无中心的。

##### 3. 师生关系的解除与知识的消解和认识框架的转换

数字化平台的形成使得对“博学”的崇拜消失得几无影踪,因为个人,无论多么博闻强记,与庞大的数据库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因而“记忆的知识”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迅速从数据库中获得所需知识的手段。记忆的知识在人类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知识的消解对原有的思维框架中命题的判断、逻辑的推演造成强大的冲击。

至此,自然平台上的建立在推理逻辑基础上的思维体系的立体结构,和建立在权威制定的规范基础上的交往体系的立体结构一道土崩瓦解,在数字化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网状结构。

#### 【参 考 文 献】

- [1][4] 陈志良. 虚拟:人类中介系统的革命[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57~63.
- [2][3] 魏小巍. 有和无的现代形态:虚拟的哲学基础试说[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1):1~4.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78.
- [6] 维纳. 人有人的用处[M]. 陈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6.
- [7][10]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 麦克卢汉精粹[C]. 何道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65~370.
- [8] 列宁. 列宁全集(第5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19.
- [9] 赫尔曼·哈肯. 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M]. 戴鸣钟译.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 233.

(责任编辑 殷杰)